

中国农民

收入研究

徐永祥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农民

收入研究

主 编 徐永祥
副主编 饶江红
欧阳剑平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收入研究/徐永祥主编.—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90-3260-3

I.中… II.徐… III.农民—收入—研究—中国 IV.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571 号

中国农民收入研究

徐永祥 主编

出版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南昌市蓼州街2号附1号
	邮编:330009 电话:(0791)6623491 6639342(传真)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85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90-3260-3
定价	36.00 元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全局、着眼长远的重大决策,是对新阶段“三农”工作的深化和发展,充分表明了中央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信心,集中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根据 20 世纪我国的国情,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小康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描述,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翻两番”、“三步走”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过大,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城市搞的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在今后 30 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 1978 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反哺农业,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 30 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基于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状况,采用纵横交错和实证的方法,对与农民收入直接关联的“三农”问题、农业制度、反贫困、对农补贴、农业风险、农民工、乡镇企业、农业产业结构、粮食安全、职业农民、农民转移、城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角度作了探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政府决策部门和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本书各章节撰稿人:徐永祥(第一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饶江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王建平(第一章第一节);刘晓东(第一章第二、三节);熊坚(第六章、第七章);朱宏(第九章、第十一章);李涛(第十二章);欧阳剑平(第十章、第十三章)。全

书由徐永祥统稿并定稿。

本书经历了一段不短的蕴酿过程,在我与朋友合作完成的三个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基础上形成了本书的框架。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及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举和致谢;并得到了江西出版集团、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本书不足、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徐永祥

2007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三农”问题	3
第二节 中国农业制度约束下的小农经济	9
第三节 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12
第四节 反贫困与农民增收	17

第二章 农民收入的现状研究

第一节 农民收入的构成和认识	25
第二节 中国居民收入分析	30
第三节 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比较	35
第四节 中外农民收入比较	40

第三章 农民收入的变化

第一节 农业经营收入的变化	49
第二节 涉农价格与农民收入	53
第三节 对农补贴分析与政策取向	57
第四节 农业风险的分散	60

第四章 非农收入的增长

第一节 农民工的收入	67
第二节 农民办第三产业	71
第三节 乡镇企业与农民收入	77
第四节 国家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	80

第五章 农业结构调整的贡献

第一节 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87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探究	98
第三节 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	102
第四节 现代农业框架下发展职业农民的思考	111

第六章 打工经济探究

第一节 打工经济的形成	119
第二节 农民工的经济学分析	122
第三节 打工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26

第四节	农民工素质与职业技术教育	130
第五节	农民工权益与权益保障	135

第七章 农民转移与农民收入

第一节	中国农民转移的必然	147
第二节	农民转移的经济学分析	154
第三节	转移农民的对策与载体	159
第四节	农民转移趋势分析	163

第八章 城镇化建设与农民增收

第一节	城市化建设发展沿革	167
第二节	城镇化建设与农民持续增收	170
第三节	国外城镇化发展模式比较和借鉴	175
第四节	城镇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181

第九章 工业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	187
第二节	工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190
第三节	乡镇企业与工业化	195

第十章 第三产业与农民增收

第一节	三产中农民增收的机遇分析	203
第二节	第三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207
第三节	涉农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212

第十一章 农民负担问题研究

第一节	沉重的乡镇财政	219
第二节	农民的隐性负担	226
第三节	农民负担的不确定性分析	231

第十二章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内涵与发展	237
第二节	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分析	241
第三节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构建	246

第十三章 农民增收展望

第一节	农民增收模型的建立	257
第二节	乡镇公共财政的建立	260
第三节	强势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取向	264
第四节	农民增收的近期对策与展望	268

参考文献	275
------------	-----

第一章 概 论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成为现实生活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哺育了中华民族,结出了中国古代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是数百年来,我国的农业长期停滞不前,“三农”问题由此凸现。“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

“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能否抓住机遇,继续深化认识和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必须把全党、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高度。

第一节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它不但是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三农”问题还与中国特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分不开。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我国实施了“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行“以农补工”的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人为地扩大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以“剪刀差”、农业税等形式源源不断地提取农业剩余,从农村抽取巨额资金支持工业化发展的战略。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的资金高达5100亿元,而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广大农民将自己创造的1/5的财富无偿地贡献给了国家的工业化,而自己的收入提高不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通过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抽取资金,支持城市建设。据专家估算,按照当时的征地制度,征地价格大致为实际价格的1/20,失地农民一年要为城市建设贡献1万亿元的资金,以至于城市越建越美,而农村面貌改变不大,出现了被外国人形容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时代反差。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它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不仅关系着占全国总人口约70%的农民的生计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关系着城市和我们的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和安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对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写照。“三农”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说:“中国的农村,不是稳定发展的基础,就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要关注并着力去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能否抓住机遇,继续深化认识和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必须把全党、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高度。要深刻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紧迫性,深刻

认识增加农业投入以及农民收入的关键性。

一、“三农”问题的产生

应该说,“三农”问题的形成与产生是有其渊源的,与历史上的贱农、戏农、伤农的旧伦理、旧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既是旧观念的延续,也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建国后,我们政府相当重视农业生产,从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遭受了农业大减产、全国大饥荒、经济大倒退的挫折之后,政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农业发展列为经济建设的首位方针,50年来一直坚持这个方针。特别是1978年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发展农业的方针,在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调动了全国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连续多年以较高的速度发展。1996年,我国农业获得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耕地只有世界总量的7%,但却供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7年以后,中国成为了农产品的出口国。

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村、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农民数量却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1978年中国农民有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2%;到了1999年农民增加到87017万人,占总人口的69.1%,21年里增加了800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81万人。2004年,农民数量上升到9亿多。这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措施至今没有较大的改动,城市、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村居民享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城乡社会发展呈现出“断裂”的二元状况。这种“断裂”的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9亿农民的问题、广大农村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今后必须解决的最大的经济社会问题。21世纪初,“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我国现代化成败的瓶颈问题。

现阶段“三农”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耕地面积与土地制度

我们常说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总数22%的人口,这是个奇迹,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我国长期以来的人地比例关系一直不太合理,迅速增长的人口与日益减少的耕地形成了一组很尖锐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据统计,解放之初的1952年人均耕地尚为2.82亩,以后则呈逐年下降之势,1957~198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亿亩,净减少2.3亿亩。其中,城镇每年扩张侵占耕地4500万亩,乡镇企业占用耕地1000万亩,非农建设耕地800万亩,水土流失600万亩,农民建房占用500万亩,开发区占用300万亩,沙化200万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乱占滥用情况的普遍,耕地面积减少的势头相当惊人。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1998年降为19.45亿亩,2000年进一步下降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仅为1.51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5%。2005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逐年减少到1.4亩。而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上年度末净减少460.2万亩,已经快触摸到18亿亩这一政策红线了。目前,我国耕地面积超过1亿亩的省份只有6个,形势的严峻程度可见一斑。

同时,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户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应该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赋予了农民一定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和流转权,但细小、分散的农户家庭承包经营造成规模不经济,农地使用权的界定和运行充分重视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农地使用权的非统分流转使得既有的农地使用权分布状况无法改变,无法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速度过于缓慢。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但一家一户的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来说,其影响是有限的,难以形成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农民土地权的不完全,使得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这也是中国土地征用失控,人均耕地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

2. 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这种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农业人口被集中在农村,非农业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的状况,广大农民在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都出现严重的失衡,致使两者在就业、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出现了太多的不平等,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对城市人口有利,对农业户口的人是不利的。长期实行的结果,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是造成目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3. 公共财富分配不公

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致使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城镇居民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多数农民则要靠自力更生;城镇居民享受完全的义务教育,广大农村却要靠农民集资办教育,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的义务教育实行中央领导地方负责,至于地方具体由哪一级来负责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至少该由省级财政主要来承担。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也是如此,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85%给了城市,只有15%给农村。现在有些地方农村的合作医疗防治体系基本上名存实亡,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乡镇连卫生院都卖掉了。农民上学难、就医难的现象亟待扭转。

二、“三农”的现状

1. 农村发展仍然落后

表现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资源不断减少。一些国际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养活养好一个人需要4亩耕地,而我国目前人均有1.4亩耕地,却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虽说成就巨大,但毕竟压力也大,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而且,由于建工厂、修公路、盖住宅、发展小城镇以及大兴开发区建设等,都大量地挤占了有限的耕地资源,我国每年流失的耕地面积均在上百万亩的惊人的数字之上。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成了一对相当尖锐的矛盾。

2. 农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农民增收缓慢

政府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视,这几年是有目共睹的,从2004年始,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有关“三农”国策就是一个力证。但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的基础不稳,投入不足,导致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科技投入太少,农业增加值中科技的贡献率不足40%,这一缺陷使得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潜力大打折扣。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据统计,1978~1984年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4%,粮食产量从3亿吨增加到4亿吨,增长33.6%,年均增长4.95%。自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123亿吨后,粮食产量连年下降,2002年为4.570亿吨,2003年更是降至4.306亿吨,比上年减产5.8%。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潜在地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更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趋缓甚至下降,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2004年中央加大对农村扶持的力度,农民收入年增长超过6%,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但从总体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还远未形成。由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1984~1998年间,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从1997~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一年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6:1,1984年为1.8:1,1985年为1.7:1,1997年为2.47:1,2003年为3.23:1,2005年为3.2:1,其中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更为困难。有的专家指出,如果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包括住房、教育、卫生等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惊人的6:1!从基尼系数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至0.456。1998年与1980年相比,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3. 农业人口过多,农民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农民人数较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我国在1952年大规模工业化开始时,有5亿农民。到2003年工业化已发展到中期阶段,而农民反而增加至9亿多,比1952年增加了4亿农业人口,这在大国工业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农民的素质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比较匮乏。由于农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普遍较差,致使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对农业产业化更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占3.4%,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的比例高达76.4%。另一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尚待加强,“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敢想、敢闯、敢干的现代竞争意识,抱着从祖辈那里沿袭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旧的生产方式不放,满足于粗放经营的传统,这种现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三农”问题的应对策略

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它的弱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从政策上对其进行倾斜和扶持。“三农”

问题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三农”这一难题,已成为我们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重视。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任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这其中必然有体制改革和利益格局调整的“阵痛”,也会有新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摸索和失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我们必须以“五个统筹”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

1. 要正确认识,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常言道“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在加入 WTO 的新格局下,我们只有继续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的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努力把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逐步建立新的体制,才能逐步使农民减少,才能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才能逐步把农民问题解决好。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2. 加强土地资源管理,改革土地承包制度

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土地已成了稀缺资源,必须加以合理利用,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要严格贯彻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对高产优质农田进行永久性的保护,严格控制城镇和开发区的用地规模,积极稳妥地开发后备耕地,确保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

在加强土地管理的同时,要积极对现行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政府土地立法要兼顾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经常受到损害。一些地方政府擅自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随意扩大机动田,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频繁调整承包的土地;为树政绩,强行干涉农民的经营权;不负责任地征用口粮田,甚至还克扣、挪用农民应得的征地款。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农民的利益缺乏有效的法制保障。随着经济全球化及高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的土地应当流动起来,规定农民个人在享有土地经营权的同时,对土地应有转让入股、租赁、抵押和继承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中介组织,使生产与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基础上,逐渐引导中国农业和农民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3. 改革城乡户籍制度,给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

半个多世纪以来,产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过度提取农业剩余,造成城乡税负的极端不公,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致使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教育等国民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落伍的户籍制度更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绊脚石,我们说要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因此,必须下决心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废止一切不合理的出生、教育培训、医疗、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给予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

权。否则,农村经济无法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无从谈起,农民成不了国民,“三农”问题就永远也破解不开。

4. 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提高人口素质

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市民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城市“壁垒”太高、城乡就业不平等的政策因素影响之外,农民素质较低、观念陈旧,技能缺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和现代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政府不仅要改变教育投资的重点、提高农村教育投入的比重,而且要根据农村劳动力过剩,转移困难的实际,探索和建立农村职业技能教育体系,通过实施各种扶植政策,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学校,尽可能使更多的农村适龄劳动力受到必要的技能教育,为他们的择岗、迁徙、就业奠定基础,为解决工业化加速过程中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创造条件。2004年初,农业部等六部委已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了地方政府的工作范围。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做好相关规划,拟定专项支出计划,以财政资金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随着“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在各地的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提高农民素质将不再是一句空话,农民“市民化”的瓶颈一定能破除。

第二节

中国农业制度约束下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又称“个体农民经济”,指建立在小块土地个体所有制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以自己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农业经济。不过,通常所说的小农经济,主要是就其经营规模和个体劳动而言,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封建制度下不仅自耕农,包括租种小块土地的佃农,实行土地国有制或村社所有制下分种小块耕地的农民,都是小农经济,自耕农是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如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偏远地区的农村,也都大量存在这种经济现象。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

一、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奴隶社会初期大量存在。在封建社会中,是农业中的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中的小商品生产发展起来,小农经济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少数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多数沦为无产阶级,或为资本所控制,失去独立性,成为资本主义农业体系的一部分。

就封建土地所有制下,佃农这种小农经济来说,它是封建农业生产的基石。在旧中国,长期存在着落后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个体小农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以一夫一妻(或多妻)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作为封建农业经济的载体,无疑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耕小农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农民阶级中采取小农生产组织形式的重要阶层之一。它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确立,由原来的农村公社成员转化而来的。自耕农尽管受到强有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支配,承受着种种义务,自由程度比较低,但他们都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理权。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实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紧密结合,使劳动者得以直接支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由于生产效益与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封建时代的自耕农具有很高的生产主动性和创造性。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个时期自耕农占据农民阶级

的主体地位、土地向自耕农手中倾斜,哪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就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这种小农经济体制的出现在当时和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由于农民土地可以私有,经营比较自主,人身依附关系较轻,因而比之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力图用增加劳动投入和改进技术的方法,争取小块土地上更高的产量,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其特点是农艺水平和土地利用率高,可以用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保证了中华古代文明持续而不间断的发展。它是中国古代农民的伟大创造,但其成型和发展则是与这种小农经济体制分不开的。

这种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和消费,小农业与家庭工副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体,它所能掌握的劳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虽然有限,但利用比较充分和合理,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适应性,能够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虽然不免贫困破产,但一俟条件稍有改善,小农经济马上重新展现其蓬勃的生机,支撑起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封建“盛世”。

但细小、分散的小农经济制约着精耕细作的发展方向。精耕细作有不同的类型,农艺改进与生产工具创新相结合,使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得以同步发展,像汉代的“代田”法那样,是“节劳型”精耕细作。农艺改进靠增加劳动投入而不与生产工具的创新相伴随,劳动生产率不能随着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像汉代的“区田”法那样,是“多劳型”精耕细作。这两种类型的精耕细作长期并存。从秦汉到唐宋,农艺、牛耕和农具有新发展,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节劳型”精耕细作仍占主导地位。但唐宋以后人口增多,农户的规模和耕地进一步缩小,农具没有改进,牛耕普及程度倒退,精耕细作越来越向“多劳型”倾斜。农艺水平和土地利用率达到新高峰,但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以至下降,个体农户的生产能力未能正常发挥,这成为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中国农民以勤劳勇敢著称,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曾经创造和支撑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个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群体,何以长期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剥削受欺压的弱势地位?根本原因就是小农经济的细小、分散和缺乏组织性。

二、中国现代的小农经济

中国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根本改变了小农经济的落后状态,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但是,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还残存着,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交换和分配上都有反映。近20年的改革历史,中国农村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广泛而强烈,但目前仍然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单家独户的生产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小农经济运行的这种固化状态已经引起了一系列不利的日趋严重的经济后果:农业经济难以实行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生产力难以被广泛采用,科技在农村的推广代价过大,整个农业生产的成本不降反升,农村第三产业和加工企业因没有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作保障而难以大规模发展,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因能力、水平、效益所限,无法应对日益市场化的现代经济的冲击而衍生出种种矛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就是证明)。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经济一直在手工劳动为主的家庭式的生产力水平和规模的半封闭运行中徘徊不前甚至萎缩。

小农经济及其传统影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阻力,但这种改革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探索之后,终于确定了新的改革目标模式。党的